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口述历史进路

马伟华 张亦弛

摘要: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学科的界限,以其独有的价值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时代叩问而言,口述史以其事件性、主观性与公共性等特点,使得以集体记忆巩固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而以口述史方式所提取的,基于个人生命经历的记忆具有进一步升华为更高层次的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潜力,能够通过巩固中华民族历史根基、挖掘中华民族精神意涵、实现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三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此,以呈现形式与依托载体创新拓宽口述史资料传播的横向广度,并结合数字化技术与仪式操演等方式实现口述史资料的长远纵向传承,是以口述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口述史;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集体记忆是特定群体关于过去全部知识的总和^①,反映了其历史认知、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情感体验,对于群体成员具有行为指引与凝聚组织的作用,且能够以横向传播与代际传递的方式加以延续,从而进一步增强群体认同。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看来,集体记忆是“对于过去意象的重建”^②,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成的产物。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谁掌握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络与原动力。”^③不断地追求内部整合是共同体永不过时的命题。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便是共同体以此需求为内在尺度,以突出诠释、淡化消除的方式作用于记忆客体。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与结构性遗忘的过程中,共同体内部记忆实现了规范、同化与整合,形成了一套集体记忆的模式与框架,使之服务于共同体作为记忆主体的需要,从而凝聚、强化、巩固群体认同。

中华民族自形成、发展,到如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厚重的历史逐渐沉淀为民族内部的集体记忆,其作为“中国史”最为鲜明的写照,如同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的同时遗留在原地的清晰车辙。可见,将集体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研究,不仅视角新颖且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界已经注意到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价值,并结合相关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现实取向,从记忆层面切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在一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MZ016)

作者简介:马伟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研究;张亦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1—126+148页。

②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③ Mich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Radical Philosophy*, Vol. 11, No. 11, 1975, p.25.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谱系。但此类研究大体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理论描述“抽象化”,以泛谈记忆生成、作用机制等宏观理论架构为主,缺乏对诸如记忆分类、记忆提取等中观、微观方面内容的分析研究,“相对空洞”的现象较为明显,难以实现理论的地方性转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指导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问题探讨“对策化”倾向过重,部分研究侧重对浮于表面的对策讨论而忽视开掘研究本身的理论深度,因为缺乏深层分析而无法探明集体记忆发挥作用的内在作用逻辑,也就难以提出更具实效、创新且有价值的见解。不难发现,当前研究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局限于本学科重点研究领域与话语体系,而缺乏跨学科交流对话的结果。因此,本文试图结合社会学与历史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以口述史为切入点,探索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记忆载体,其内含的记忆从内容与形式而言具有怎样的特点,对于巩固共同体认同而言具有哪些独到价值,进而探讨口述史所呈现的个体记忆通过怎样的升华,成为一种国家记忆、价值记忆与文化记忆,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出特殊作用。

一、何以作用: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口述史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其诞生之初仅仅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佐证与补充档案而存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历史学的后现代反思与自反性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超越档案资料与具体方法,从记忆视角来看待口述史的理论意义与学科价值。如意大利口述史学家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曾指出,记忆是一个进行意义创造的过程,而口述资料对于历史学家的特殊价值在于加深其对该过程的理解。^①随着学科的发展,口述史研究越发侧重于对口述资料本身的理解、诠释与分析,其应用广度也从历史学逐渐扩展至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

有关过去的集体记忆是共同体为了证实自身现实存在与内部关系的合法性而作出的合理化建构。^②通过集体记忆,共同体的起源与流变过程逐渐清晰,其成员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认同及彼此间的关联感得以巩固。然而,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多重表现形式,可能依托于实物,抑或流露于文化实践活动,何种形式的集体记忆能够更加有效地巩固共同体意识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口述史学在与记忆理论联袂完成意义深远的“记忆转向”过程中,进一步证明了其作为集体记忆载体在巩固共同体认同中的独特价值——个体体验的事件性、情感鲜明的主观性与历史建构的公共性。

(一)事件性:一种增进真实认知的“历史闪现”

毋庸置疑的是,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载体,其独特性体现于所呈现历史叙述的“闪现性”——与传统史学界所惯用的宏大且成体系的线性历史叙事相对应,口述史依托模糊不定、个性强烈的个体记忆。因此,其更多是由一些碎片化事件所构成的,借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之言,“只有当叙述到了关键时刻,某个记忆闪现在心头时,才能去抓住它”^③。这种不连贯的事件性特质早先为许多历史学者所诟病,认为其对于系统化的历史体系建设无益。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

^①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52.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③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7页。

尔(Patrick O' Farrell)曾尖锐地指出口述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与非历史性的主观世界”^①。然而,这种以自上而下方式传递的所谓“系统化历史体系”所呈现的仅仅是概念化的过去,公众由于缺乏具体参照而只闻其事不明细节,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对于共同体历史的认同感更是无从谈起。久而久之,记忆乃至历史的传递将会越来越刻板与僵化,甚至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滋长的温床,进而动摇一个民族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

口述史作为非线性的事件化叙事,能够使我们有机会倾听隐藏在芸芸众生中的生活叙事,为我们提供那些宏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个性化、形象化细节,组织起那些散落于线性历史之外的记忆与话语。在已有历史叙事基础上补全其中缺失的主观个体层面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时代,使我们更加贴近历史并强化我们对于历史“确曾发生过”的实感。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一些曾经转化为文本、沉淀于记忆的历史将会如一幅鲜活画卷般缓缓铺陈开来,展现于世人眼前,使我们能够以最真切生动、具体可感的方式增进对于历史的真实认知,从而不断加固我们对于自身历史起源的信念与认同。

(二)主观性:一种引发心灵共鸣的情感叙事

口述史的叙事特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之以个性化的事件亲历者为主体,口述访谈过程中得出的资料与受访者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其中难免夹杂大量价值判断与主观情感因素。秉持实证主义观点的历史学者因之对口述史方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主观情感色彩浓厚的记忆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必要的,然而实际上,有能力获取饱含主观情感信息的记忆是口述史方法所独有的价值。集体记忆不似文献记录,它不是一种对过去刻板又完全一致的重现,更多体现了人们的情感价值态度,是人们对于历史的主观理解。^②口述史的受访者是情感化的个体,且内容依托于受访者的个人生命经历与心灵体验,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因此,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的“非理性化”与主观性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客观历史事件中,置身其中的人们生命状态和个人感受如何,并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行动。

对沉淀于历史海洋之中的集体记忆的追索、记录与传承,就巩固共同体意识而言非常必要。然而,秉持客观立场,进行宏观叙事的大部分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历史叙事由于远离日常生活而难以展现一段真正鲜明的历史,更毋论能够引发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但口述史不同,历史镌刻于受访者也即亲历者的心灵,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讲述更多的是一种更加动人的情感叙事,情感交流的结果即是心灵的贴近与共鸣。这种基于生动、直观且情感丰富的口述表达所建立的、能够同自身类比并引发共情的认同感,要比依托宏大、客观历史事件所建立的认同感更加稳定持久。^③因此,以历史亲历者的记忆为依托,通过更加通俗易懂、情感丰富的口述史形式所构筑的群体历史,能够使人们在增进历史认知的同时,通过心意互通的情感交流,更加深刻且细腻地体会宏大历史对于微观个体而言的真实意味,从而产生深切的心灵与情感共鸣,对于延续共同体情感、增强共同体意识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三)公共性:一种强化群体认同的公众讲述

口述史与其他记忆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公共性比较显著。一方面,口述史是公众讲述的产物,其主体具有公共性。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口述史学领域深受后实证主义方法与“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影响,试图摆脱原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访谈模式”,认为来自社会底层的普

① Patrick O' Farrell, "Oral History: Facts and Fiction," *Quadrant*, Vol. 23, No. 11, 1979, p.5.

②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0期,第109—112页。

③ 胡洁:《基础、生成与建构:从社会记忆到社会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151—156页。

通大众亦具有历史话语权,致力于依托社会公众的叙事书写那些曾经“隐藏于精英话语之下历史”^①。英国著名口述史学者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史作为历史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历史学最重要的一项价值便在于其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同时为历史发展注入了活力,因其所定义的历史“英雄”不仅来自有名的领袖人物,同样也可能来自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公众。^②另一方面,口述史最终将面向社会公众呈现,其受众具有公共性。口述史所独具的平民性与叙事性,使其对于公众而言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③在此过程中,公众也不只是历史事件与记忆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会在既有自我认知与经验基础上对其作出解读、分析、重构。口述史的公共性意味着历史不再为知识阶层所垄断,社会公众的历史记忆同样弥足珍贵,他们也因之具有历史的话语权与解释权,应和了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提出的那句著名口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以口述史方法挖掘历史记忆的过程也是高度公共化的,无论是作为受访主体的历史亲历者,还是作为呈现受众的社会群众,都作为“沧海一粟”的社会公众而存在。口述史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作为真正意义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而存在,这种“人人可述”的方式增强了公众对于历史话语权的获得感与社会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平等感,以此拉近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员间的距离,增强了人们对于共同体身份的认同。而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对于这些历史记忆的自我解读也能够使其进一步理解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化的人”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二、何以关联:以口述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认同感。作为集体记忆的提取手段与表现形式,口述史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内含巨大潜力以待发掘。不难发现,口述史所得出的资料就其表面来看存在一些断裂、碎片化且不成体系的个体记忆。这些特性使得记忆难以长久留存,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作用的稳定性也难以保证。因此,需要深思的是用口述史方式所提取的,基于个人生命经历的记忆如何进一步升华为更高层次的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以此更加长远地发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一)从生命记忆到国家记忆:巩固中华民族历史根基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社会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内嵌于历史时间、地理区域、社会关系、生命事件之中,个体也因此在这样的时间关系与具体事件中被塑造出来,成为社会力量与社会结构的产物。反之,通过分析个体在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与自我感受,那么在这种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中,便有可能发现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便成为口述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亲历者口述资料所体现的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实践经历与情感体会不仅是个体记忆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映射了一定的场域空间与社会结构。^④也就是说,口述史的方法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道架设于个人日常生活记忆与宏大历史背景之间的桥梁,可以使其自如地穿梭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充分发挥社会学

① 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584.

②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8-9.

③ 李娜:《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跨学科的对话》,《史林》2015年第2期,第195—203+222页。

④ 王智慧:《记忆的创造与表达:口述史与体育记忆的建构机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8期,第41—51页。

的想象力,在对形塑口述记忆的社会逻辑进行把握和建构的同时,捕捉到官方资料在事先定义中无法获取的真实状况,从而对社会历史作出深刻解读。此外,口述史作为真实的历史见证与记忆,能够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完整性,且对于历史史料的真实性起到一定的印证作用。因此,以个体生命记忆形式呈现的口述史,内含着升华为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潜力。

守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口述史发挥着特殊作用。例如,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上的《“老西藏”讲故事》专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进藏军人、有志青年为代表的“老西藏”群体的人生动态口述史作为主要内容,这些“老西藏”们所处地域、身份背景与人生境遇不尽相同,因而其口述内容各有侧重,带着明显的个人生命色彩,却不难从这些个人口述回忆中建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工作,以及在此过程中结下深厚民族情谊的真实图景——从家庭组织、民族关系到社会结构,这些个体生命记忆经由汇编与整合,不断升华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切历史,成为属于“老西藏”群体的集体记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记忆。自真实生命记忆至宏大国家记忆的升华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基固本,沉重打击了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特点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对于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事实性建构有助于深化国民的历史认知,唤起国民爱国主义精神,加固“五个认同”,从而有力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从情节记忆到价值记忆:挖掘中华民族精神意涵

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带上共同体内部价值取向色彩并反映其内部结构性诉求,体现于集体记忆系统内部由情节记忆到价值记忆,由表象记忆到本质记忆的过渡之中。在此过程中,集体记忆系统内部逐渐实现“记忆客体的主体化”,记忆内容在共同体诠释与重构的基础上,以选择性回忆与结构性忘却的方式趋近并服务于共同体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从而为记忆打上鲜明的共同体烙印。^①依此逻辑来看,虽然口述史所提取的记忆看似由生动具体的生活情节碎片构成,但其叙事从根本上并未脱离一套固定的“集体框架”——我们总能从一个群体内部不同个体的记忆中提取出其所共有的“群体气质”,叙事方式与重点、价值取向与研判、情感特征与依托均有着鲜明的群体特色,而这种“集体框架”的存在为口述史的情节记忆形式向价值记忆本质的飞跃创造了可能,最终指向巩固共同体内部认同的根本需求。

在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集体记忆进行口述史研究时可以发现,特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的口述历史陈述各异,却能够从这些真实生动的微观历史中抽象出独特的“群体精神”,并实现由情节记忆到价值记忆的升华——追忆战争年代,来自汉、满、蒙、回、藏等四十多个民族的抗日老战士们在口述调查中所讲述的抗日战斗故事,其高度生动个人化的情节凝汇为“热爱祖国,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更展现出战争年代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水深火热之际“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的共同体意识。回首建设年代,从包钢建设口述史中我们了解到,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家钢铁企业的建设,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守望相助,为民族地区工业建设事业的起步打下深厚基础,且共同铸就了“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包钢精神”;放眼新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族群众的抗疫口述实录真切展现了不同民族间倾力互助、共克时艰,如同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共同铸就了积极向上、人民至上、共渡难关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样的群体精神汇聚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各族人民紧密协作、共同奋斗的精神遗产,体现着

^① 詹小美、康立芳:《集体记忆到政治认同的演进机制》,《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4—118页。

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社会整合的强大凝聚性力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从交往记忆到文化记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整合

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记忆包含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两种类型。其中交往记忆在个人生平经历框架中形成并由特定时代的人们共享,是一种“代际记忆”。当这些相对烦琐的交往记忆因“过度膨胀”而无法为社会交往所容纳时,文化记忆应运而生,它超越了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边界,依托于客观外化物、文字、仪式等,作为“记忆中转储存器”的符号体系而存在,具有“超越生活之大”。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由群体内部“共同的语言、知识与回忆”编码而成,社会互动依此开展,并不断建构与再生产出“整体高于一切”的群体认同意识。^①可见,相较于非正式的交往记忆,高度成型的文化记忆蕴含着能够巩固群体认同的文化内涵。为了巩固内部认同,一个群体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强化集体记忆,以举办共同的仪式,建立永久性实体纪念物,加强历史教育等方式对其进行制度化传递。^②总而言之,文化记忆的形成与传递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来丰富自身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口述史受访者的记忆以个体生命经历为线索,呈现出交往记忆高度生活化的特征,然而一旦以口述资料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在文本呈现的佐证之下,它便拥有了超越交往记忆边界、进入文化记忆范畴的潜力。因此,从更为长远的眼光看待口述史资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不能仅仅停留于以主观化生活描述为特征的“交往记忆”,更要探索如何实现口述史向“文化记忆”高度的上升,以使之超越一代人的界限,实现记忆的代际传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多内容、多层次的文化系统”^③,夯实中华文化基础、推动各民族文化整合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意义重大。对于中华民族革命与斗争、建设与发展历史的亲历者进行口述史访谈,并将其记忆进行文本化记录与处理,则为进一步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线索与佐证。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外化载体,无论是以纪念物、节日、仪式为代表的象征符号,还是诸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记忆之场”,均无法脱离口述史对其意义表征的阐释与丰富。口述史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形塑、丰富与完善提供重要历史依据与文化素材,进而稳固我国主流文化核心地位,形成高度整合的强有力文化记忆,而后者对于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强化与情感凝聚具有重要意义。

三、何以创新:口述史资料的挖掘整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应用

口述史以其特有的个体化记忆表现形式,存在升华为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口述史在增进国民历史认知、维系国民情感认同并为之提供价值引导等方面的意义非比寻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与作用空间。在对其进行切实研究与现实运用的过程中,需要秉持发展的理念,对其呈现方式、作用形式与传承模式进行创新性探索,使得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在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仍然鲜活存续且不改底色。

(一)呈现与载体创新:拓宽以口述史资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横向广度

口述史于美国初兴之时,仅仅作为历史学家挖掘、收集与储存原始史料的方法与手段^④,故而

①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9页。

③ 詹小美、揭锡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页。

④ Allan Nevins, *The Gate Way to History*, New York: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38, p.4.

主要以较为单一的录音与文本的形式进行记录与呈现。随着现代技术水平发展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于口述史研究范式、适用范围与多样化价值的深入思考,口述史越发重视借助多样化载体实现记忆内容提取与形式呈现,有学者也因之更重视在技术革新层面看待口述史,并将其定义为借助现代技术来记录、保存、呈现亲历者所叙述的历史。^①

我国口述史的发展形态与方向也随着技术环境的进步而呈现出不断变迁的趋势,在录音、录像设备逐渐专业化、精细化与规范化的基础上,口述历史的呈现方式不断走向多样化与丰富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口述资料依托于纸质、电子出版物,推动口述史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以更加便利化、开放性、平民化的方式走向大众,如《藏族妇女口述史》及《“老西藏”讲故事》等。另一方面,口述历史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影像呈现”方式,借助影像所特有的直观性、生动性与真实性来更好地再现历史情境,以可视化手段与艺术观赏性吸引公众,并通过展现口述者的表情动作、讲述语气等细节来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如纪录片《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中国记忆》等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在于各族群众,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探寻以更加通俗易懂、生动直观、情感丰富且深刻的口述史呈现形式唤起并构筑各民族团结协作的共建历史,在当下显得尤为紧迫。为了更好地发挥口述史唤起各族群众历史认知、凝聚群体情感与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口述史的学理化探讨,还要进一步对其呈现载体进行多样化探索,不断丰富公众接触口述史的途径,进一步提升历史传播的广阔性以及各族群众获取历史资料的便利性,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追求以更具吸引力、感染力与表现力的方式展现个体、民族与国家记忆,使得各族人民、不同社会群体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缩小彼此间的差异,在推动内部同类化、增进平等感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实现各族群众中华民族认同和情感的凝聚与深化,以此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技术与操演并行:实现以口述史资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承

数字化革命的席卷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口述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模式、记录储存方式与内容呈现形式,为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口述史研究者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所言:“数字化技术改变着我们这些口述史研究者学术工作的多个方面,从如何收集与叙述故事,到如何创作与共享历史记忆……口述史学的将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不确定性。”^②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如阿斯曼所言“社会交往过度膨胀”局面的形成,越来越多的社会记忆沉淀无处安放而流离失所。在新技术变革与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背景下,口述史资料数据库的建立为口述记忆的储存、提取与共享提供了可能——大数据技术能够将纷繁复杂、浩如烟海的口述资料进行识别、分类并编码,以便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能够长远留存与永续传递,且为群体成员所共享,最大程度上方便其阅览、交流、互动与分享。诸如此类记忆工程已经为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所重视并开展,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建设的“世界记忆工程”、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英国大英图书馆的“国家生活故事”等。^③

中华民族的抗争、建设的历史也是各族群众患难与共、团结互助、发展共享的历史,各族共建、互助的历史记忆浩瀚如海,且对于强化各族群众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至关重要。然而,我国相关

① 谢治菊、范飞:《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7期,第48—55页。

② Alistair Thomson,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4, No. 1, 2007, p.70.

③ 全根先:《口述史、影像史与中国记忆资源建设》,《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16页。

口述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标准化、体系化发展模式。长此以往,这些历史记忆或仍然封存于亲历者脑海之中无从发挥作用,或因杂乱、碎片化以及不成体系而难逃消逝于历史长河的命运。因此,在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中,有必要重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的运用,重视多样化主体的口述资料收集,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民族互助、共建历史记忆信息数据库。在信息网络基本普及的今天,此类记忆工程的建设将书写历史的权利赋予每个民族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令其生命经历与情感体验得以世代留存,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力量得以更为持久地发光发热。

然而,仅仅依靠文本化的记录无法使得社会记忆摆脱其传承困境——在社会体系大转型时代,只有将过去的历史叙事与今日价值观念及信仰体系相契合,记忆才能代际传递下去。^①因此,不仅要关注对于口述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其中所蕴含集体记忆的有效代际传承。在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看来,仪式操演是保证社会记忆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持续性的重要方式,纪念仪式通过操演作用使群体成员产生习惯记忆,身体实践则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保持社会记忆的重要性与持久性。^②口述史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记忆的文本化或可视化呈现,而且要在尽力寻求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契合点的基础上,力图借助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的方式,在反复操演中保证记忆的鲜明底色并实现其代际延续,否则将难逃被“档案化”“典籍化”的命运。

将口述史融入特定时空下的纪念仪式,能够在特殊仪式氛围的渲染与带动作用中增进参与者对于口述记忆的情感共鸣与内心认同,同时在仪式的重复操演中不断强化口述史所内涵的集体记忆在群体成员脑海中的深刻程度。例如,在抗战胜利纪念仪式中融入各族人民共同抗战口述史,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与仪式氛围加持下唤醒战争历史记忆,使各族群众对患难与共的手足情谊进行真切的想象与体悟,会拉近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距离感,在仪式以年为单位的重复操演之中日渐深化该段历史记忆,并使之得以代际永续传递。将口述史纳入纪念仪式的反复操演过程,使之成为通过仪式重复而得以再现并传承的文化意义的一部分。由此,不仅凝聚于口述史之中的集体记忆得以长久存续,纪念仪式也因口述细节的纳入更显意义深远,各族群众得以在纪念仪式所塑造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通过口述史增进相互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认知,构筑命运、情感与价值共同体。

四、结 语

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口述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一条创新性进路。以个人生命经历为基础,且饱含主观情感的口述史以其事件性、主观性、公共性等独有价值,使得以口述记忆巩固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口述史并不仅仅停留于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以此为载体的相关记录蕴含着挖掘国家记忆、价值记忆、文化记忆的潜力,能够通过巩固中华民族历史根基、挖掘中华民族精神意涵、实现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为了更加稳固、有效地发挥口述史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需要对口述史的呈现方式、作用形式与传承模式进行深入探索,如发掘口述史多样化载体、建立口述史资源数据库、将口述史融入纪念仪式等。

^① 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8—146页。

^②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在口述史的研究与应用中,学界对其仍然存在一定的质疑声音——作为一种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真实性?这种批判与质疑是口述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大原因。需要厘清的是,基于个人记忆的口述史能否真实地表述过去并不是它唯一的有效性要求。^①也就是说,口述史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其能够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条更加清晰和真实的脉络,而在于它能让我们看到可能不同于我们所知所学的所谓“主流历史”的另一套叙事体系下,作为个体的人们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最为生动、令我们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挖掘历史记忆,并希冀于以其凝聚共同体情感,最终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仅仅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还远远不够,对于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意义的主题,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交流”与“意会”,从而达到一种对于切身体验的“共鸣”与“共情”。当历史从个体角度进行诠释和展现时,同样作为个体的我们才更有可能触摸到其中的深刻意义,感受到事件背后紧密又热切的中华民族血脉联系,从而增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情感与价值的高度认同。

The Approach of Oral History to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a Weihua, Zhang Yichi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history, oral history has broken through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 its unique value. In terms of how 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ral histor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uality, subjectivity and publicity,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with collective memory. Furthermore, the memory based on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which is extracted by oral history, has the potential to sublimate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nd even national memory. Finally, it's possible for us 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cavating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widening the horizontal dissemination dimension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by innovating their forms and carriers, and realizing the vertical long-term inheritance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by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eremony performance, is the direc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ith oral history.

Keywords: Oral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Eleanor Conlin Casella, et al., "From Knowing into Telling: A Dialogue in Five Part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 48, No. 1, 2014, pp.71-86.